

俄国·蒙古·中国

上卷 第一册 [英] 约·弗·巴德利著

务印书馆



俄 国 · 蒙 古 · 中 国

上 卷 第一册

〔英〕 约 · 弗 · 巴德利著

吴持哲 吴有刚 译

胡 钟 达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 年 · 北京

JOHN F.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in two volumes)

The edition consists of two hundred
and fifty copies, numbered

MacMillan & Company, Ltd., London, 1919

根据伦敦麦克米伦有限公司 1919 年版本译出

根据纽约伯特·霍兰克林出版公司新版(未注年月)核对和制图

俄国·蒙古·中国

(全书四册)

〔英〕约·弗·巴德利著

吴持哲 吴有刚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471

1981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12 千

印数 1—2900 册

印张 53 1/8 插页 36

定价: 11.50 元

《俄国·蒙古·中国》汉译本序言

约翰·弗雷德里克·巴德利(1854—1940年)是英国《军旗》报驻圣彼得堡的特派记者,于1879年第一次到俄国,在俄国一直居住了十年。此后,他还多次访问俄国。旅俄期间,他曾先后到过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地。在1900年至1910年期间,他四次经由西伯利亚来到当时已被沙俄侵占的我国黑龙江地区。最后一次,他还到达我国的瑷珲、嫩江、齐齐哈尔等地。他对高加索地区的历史、地理、考古和早期中俄关系史,都作过一定的研究。巴德利的主要著作有:《俄国征服高加索》(1908年),《俄国·蒙古·中国》(上下两卷,1919年),《八十年代的俄国》(1921年),《高加索的崎岖两麓》(上下两卷,1940年)。此外,巴德利还写过不少论文,发表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中亚学会的学报上。

巴德利在黑龙江地区的几次旅行,引起了他的研究早期中俄关系的兴趣。从1912年开始,他就着手《俄国·蒙古·中国》一书的编译工作。这部书原分为上下两卷,汉译本分为两卷四册。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本书是“逐步积累写成”的,而且是“由后往前逐步积累写成”的。作者首先从事编译的,是占本书下卷一半篇幅的最后一章——斯帕法里的使华报告,此后逐步完成了下卷其他篇章的编译工作,并先行付印。后来,作者又先后撰写了地理导论、历史导论、概述,并编了参考书目和索引等,作为本书的上卷。因此,本书在编排上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即全书的参考书目和索引,不是附在下卷,而是附在上卷。

下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它搜集了不少从十七世纪初期至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去世的1676年之间,俄国遣使来我国明清朝廷和我国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地方的出使报告和其他有关档案文件,并附加了若干评注。其中出使报告共十六件:出使明廷的报告一件,出使清廷的报告四件,出使我国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诸台吉处的报告十一件。作者在上卷写了历史导论和地理导论,在地理导论中,为我们介绍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的几幅西伯利亚及其邻近地区的地图和噶尔丹策凌时的准噶尔地图等。巴德利这部书所汇集的有关中俄关系史的重要资料以及他本人所撰写的评述,对研究早期沙俄侵华史、沙俄向西伯利亚扩张史和中西交通史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巴德利作为一个西方记者,他对中俄两国历史上的人民革命运动,对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可能正确看待。此外,无论是本书的题名,或者是书中的某些论述以及地图的某些标注上,他都有意无意地将蒙古和中国并列,这是完全错误的。

众所周知,不仅厄鲁特蒙古是我国固有领土的一部分,就是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在历史上也是我国固有领土的一部分。现在苏联领导人重弹老沙皇的滥调,不仅把侵占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说成是“开发新土地”,而且把侵占我国厄鲁特蒙古、喀尔喀蒙古等地的大片领土说成是“防务”和“继承”,而把清朝政府抗击沙俄的吞并,统一我国边疆地区说成是侵略和扩张。这纯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究竟是谁侵略了谁?在这个问题上,巴德利的态度倒是客观的。他说:“满洲人是在守卫中国,而俄国人则是向西伯利亚扩充殖民地。”(见上卷第 xciii 页。凡见于本书的引文,仅注汉译本切口处的原书页码,不列书名;下同。)又指出,中国有不少土地“已经被俄国偷走”了(上卷第 xciv 页)。

巴德利在本书中所披露的十七世纪沙俄向中国封建朝廷和蒙古地方封建领主所派遣的使者的出使报告，正是从沙皇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它在使用武力向西伯利亚疯狂扩张并蚕食我国东自黑龙江流域、西迄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边疆领土的同时（在巴尔喀什湖方面，当时的中俄边界相距尚远），又如何通过它的“和平使者”进行种种阴谋活动，以求扩大其侵略成果。

以下我们将对本书的主要内容作一简介，并对有关史实略加评论。其中所涉及的历史背景，除本书提供的情况外，我们也将作一些必要的补充。

一、沙俄吞并西伯利亚

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它是从十三世纪才开始出现的莫斯科公国发展起来的。十六世纪初叶莫斯科公国统一俄罗斯时，它的疆域“北达北海，南至奥卡河，西及第聂伯河上游，东抵北乌拉尔山的支脉。”顿河中下游和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都不是俄罗斯的固有疆域。可是，正如恩格斯所说：“莫斯科的大公们……在长期斗争之后，才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许多公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①巴德利在本书的历史导论中概括地叙述了俄罗斯统一以后向西伯利亚疯狂扩张的历史。在十六世纪中后期第一个自封为“沙皇”的伊凡四世在位时期，俄国就兼并了顿河中下游和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并越过乌拉尔山，积极向西伯利亚扩张。当时西伯利亚各族人民中，除了乌拉尔山和鄂毕河之间鞑靼人所建立的西伯尔汗国以外，吉尔吉斯人尚处于封建分裂状态，其他如奥斯佳克人、撒莫耶德人、鄂温克人、雅库特人、布里亚特人等，都还处于氏族、部落或部

^① 《工人阶级同波兰的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89页。

落联盟的发展阶段。面对使用火枪的敌人，这些“只拥有弓箭”的牧人、渔民、猎户英勇不屈，奋起斗争。但是由于这种斗争是自发地、分散地进行的，终于不能对沙俄侵略者形成有效的抵抗，甚至遭到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巴德利在本书中披露的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纪行》，就承认在安加拉河中有一个岛被称为“波格罗姆纳岛”，义即“屠杀岛”（原书下卷第260页，以下均指原书）；又在安加拉河畔有一悬崖被称为“克罗瓦瓦崖”，即“血染崖”（同上），这就是沙俄侵略者在西伯利亚所犯下的罪行的无数罪证之一。巴德利还指出：这伙匪徒在迫使土著人民暂时屈服以后，就“以沙皇的名义，肆意掠夺土著人民，他们勒索的倒不是钱财，而是毛皮（主要是貂皮），违抗者或则处死或则沦为奴隶。……俄国人就这样耀武扬威地向东方和北方扩张，由一条河推进到另一条河，直到海岸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上卷第lxxxvi页）这样，从1581年叶尔马克开始入侵“西伯尔汗国”到1649年建立鄂霍次克堡，总共只用了六七十年的时间，沙俄侵略者就从乌拉尔山麓推进到太平洋岸。

“西伯尔”（“失必儿”）本来既指“西伯尔汗国”的首府，又指“西伯尔汗国”的疆土。沙俄吞并“西伯尔汗国”后，继续向东扩张，于是凡沙俄在北亚地区所侵占之地，都统称为“西伯尔”。以至最后西自乌拉尔山，东至太平洋岸的俄国侵占的广大北亚地区都称为“西伯尔”，即“西伯利亚”。

沙俄侵略者在吞并“西伯尔汗国”后，就向当地各族人民征收奇重的毛皮贡赋，疯狂掠夺紫貂资源。貂皮成为沙俄国库的主要收入之一，成为沙俄出口的大宗。侵略者足迹所至，紫貂资源往往不久即濒于枯竭。巴德利对这个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在卷首画的配诗中，巴德利并维妙维肖地刻画了沙俄侵略者这种贪婪的本性和穷凶极恶的行径：

“紫貂就是神话中的‘金羊毛’，

掠夺成性的罗斯为之销魂夺魄，

那永不消逝的诱人的魅力，

驱使他狂奔疾走，横越整个大陆。”

“阿穆尔河与北极诸海之间，

那莽莽松林都披霜戴雪；

松林深处的紫貂满怀死亡的恐惧，

在无情搜捕之下，它们已濒临绝灭。”

二、沙俄频繁遣使至我国蒙古诸王公处，

妄图吞并我国西北边疆的大片领土

沙皇俄国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方大力扩张时，它的侵略目标绝不限于西伯利亚。历史已经证明，在它逐步囊括西伯利亚的同时，西伯利亚本身又是它蚕食和鲸吞我国西北、北部、东北边疆地区的桥梁和基地。

从十七世纪初期开始，沙俄侵略者在西伯利亚积极向东推进的同时，就妄想吞并叶尼塞河中上游、鄂毕河中上游和额尔齐斯河中上游我国蒙古封建王公的领地。对西伯利亚处于原始发展阶段的氏族——部落，他们肆无忌惮地推行武力征服政策。但是对于蒙古民族，沙俄由于力不从心，当时主要是采取挑拨离间、和平诱降的政策，妄图不费一兵一卒，就达到他们的侵略目的。

沙皇俄国当时和平诱降的目标有二：一是我国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的一支，俄国文献中称之为“阿勒坦汗”，实际上仅是我国历史上的硕垒乌巴什洪台吉及其继承人——俄木布额尔德尼洪台吉、罗卜藏台吉额林沁；一是厄鲁特蒙古（本书称为喀尔木克）诸台吉，主要是准噶尔部的哈赖忽喇台吉及其继承者巴图尔洪台吉。

僧格台吉等。

明代蒙古各部从明初以来，就同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明代末期中央王朝的统治衰微，但这种联系也从未间断。本书所刊载的沙俄使者的出使报告就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如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沙俄使者托·彼得罗夫在准噶尔部就见到“大明可汗”派去的官员（下卷第37—39页）；沙俄在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派遣到明王朝的使者佩特林和蒙多夫，就是由第一代“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派人伴送到北京的。当时喀尔喀蒙古各部 and 厄鲁特蒙古各部还通过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和张家口同中原地区进行着频繁的贸易。

在清朝逐步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蒙古和清廷的关系更趋密切。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袁布、车臣汗硕垒和扎萨克图汗素巴第向清太宗皇太极进贡。此后，他们更遵守太宗的规定，每年进九白（白驼一、白马八）之贡。1655年（顺治十二年），清廷在喀尔喀设了八个扎萨克，第二代“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洪台吉就是其中之一。俄木布额尔德尼死后，第三代“阿勒坦汗”罗卜藏台吉额林沁袭职为扎萨克。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罗卜藏台吉额林沁被封为辅国公。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亲征准噶尔的叛乱头目噶尔丹，罗卜藏台吉额林沁从征，在昭莫多之役中卒于军。厄鲁特蒙古四部自十六世纪后期组成“丘尔干”（盟会）以来，一直由和硕特部的首领担任“丘尔干”的首领。早在清廷入关以前，和硕特部的首领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就已遣使向清廷进贡。1646年（顺治三年），清廷封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为“顾实汗”，又“赐甲冑弓矢，俾辖诸厄鲁特”。从这一年开始，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巴图尔洪台吉及其弟侄等，也就随着和硕特部的顾实汗向清廷遣使人贡，“附名以达”。巴图尔洪台吉死后，他的儿子僧格台吉继任为准噶尔部首

领,从1666年(康熙五年)起,就多次向清廷遣使入贡。此后,噶尔丹大举进攻喀尔喀蒙古,对清廷时叛时服,沙俄的挑拨离间和秘密支持就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德利在本书各有关部分,已明确指出喀尔喀蒙古诸汗和“阿勒坦汗”对清廷的臣属关系(见下卷第112页,169页,192页)。和硕特部顾实汗对清廷的臣属关系,巴德利在本书中也曾特加论述(见上卷第lxxxix页,下卷第143页)。

本书下卷收集了从十七世纪初叶到六十年代沙皇多次派遣到“阿勒坦汗”处和准噶尔诸台吉处的使者的出使报告和记录。这是老沙皇对我国西北边疆蒙古诸台吉处心积虑进行和平诱降活动的历史见证。这些哥萨克使者秉承沙皇或西伯利亚总督的命令,带上沙皇的一封信和一点礼物,就装模作样地以“钦差大臣”自居,要求“阿勒坦汗”或巴图尔洪台吉、僧格台吉等接受“沙皇陛下”的“崇高统治”,向“沙皇陛下”宣誓“效忠”。沙皇使者的这种无理要求多次遭到“阿勒坦汗”和准噶尔诸台吉的严厉斥责,沙皇的诱降活动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这些出使报告和记录还揭示了沙皇在进行诱降活动,允诺要“保护”“阿勒坦汗”和厄鲁特诸台吉免受“敌人”侵犯的同时,又以蚕食方式逐步侵占了他们与西伯利亚毗邻的领地。“阿勒坦汗”和厄鲁特诸台吉不止一次地为此向沙皇使者或遣使直接向沙皇提出抗议,要求沙皇归还他们的领地和属民。抗议无效,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他们就以武力来恢复他们失去的领地。只是由于“阿勒坦汗”和准噶尔诸台吉之间的内讧往往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不能协力对付沙俄的侵略。

至于说“阿勒坦汗”或巴图尔洪台吉等曾经“臣服”于沙皇,早就被国际史学界认为不过是一场“滑稽戏”而已。

三、沙俄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和巴伊科夫使华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沙俄侵略势力到达勒拿河流域。1639年，他们才听到了“第一次来自黑龙江的消息”，富饶的“达呼尔地区”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沙俄侵略者以雅库次克和叶尼塞斯克为据点，分别从北面和西面，越过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把它的侵略魔爪伸入我国黑龙江流域。

1643年，沙俄西伯利亚雅库次克总督戈洛文派遣波雅尔科夫率领一支由一百多名哥萨克组成的远征队，翻越外兴安岭，进入精奇里江（结雅河）。这是第一批闯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军。这一伙绑架勒索的强盗，地地道道的“吃人恶魔”，在我国当地达呼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英勇抗击之下，不到两年，就损失过半，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被迫由黑龙江口经海上逃跑。

由哈巴罗夫征召“自愿人员”所组成的远征队是第二批闯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军。巴德利指出：“1650年和1651年，哈巴罗夫接踵而至，在阿穆尔河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俄国人不仅极其残酷地对待不幸的达呼尔人和当地其他居民，而且还袭击顺治皇帝派去征贡的满洲军队，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抗击。”（下卷第195页）1653年，沙俄政府将哈巴罗夫召回莫斯科，另派斯捷潘诺夫接任侵略军头目。这时，清政府在关内的统治已相对巩固，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东北边疆。清政府决定一方面将俄军侵扰地区的居民内迁，一方面以武力坚决抗击沙俄的侵略。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积极支持哈巴罗夫和斯捷潘诺夫在黑龙江的侵略行动的同时，又于1654年2月亲自指派巴伊科夫出使中国。这是莫斯科向清朝政府正式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节。

巴德利在本书中发表的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首尾完整，其评

注也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给博格达汗即顺治皇帝的国书中，表示要同中国皇帝建立“牢固的友谊”，保持“亲善的关系”（下卷第133页）。其实，当时妨碍中俄之间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正是沙俄对我国黑龙江地区的野蛮侵略。可是无论在沙皇的国书中，还是在俄国政府给巴伊科夫的训令中，对此都避而不谈。这就表明沙皇的所谓“友谊”与“亲善”是十足的伪善，其目的是在欺骗、麻痹清朝政府，以便继续扩大其侵略活动。

沙皇遣使的另一目的，是想同中国建立直接的通商关系，谋取掠夺性的暴利；同时还想借此搜集中国的情报，探听中国的虚实。沙俄政府给巴伊科夫训令最后一项，是要求他“秘密”调查“中华帝国的人员、财力、军队和城防的实力和情况如何？是否在与其他国家交战？交战的原因又是什么？”了解“从俄国边境去中国，哪一条道路最近？由西伯利亚至中国的途中有哪些统治者？他们是哪一国的藩属？”以及其他经济、商业情报等等（下卷第134页）。

巴伊科夫在1654年夏由西伯利亚启程来华，在我国蒙古地区内停留的时间很长，于1656年3月才抵达北京。同年9月，离北京回俄国。巴伊科夫在其报告中强调礼节上的问题，仿佛他没有完成他的正式使命，最后被迫离开北京，是因为他坚持礼节方面的一些问题。

巴德利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巴伊科夫之所以受到不体面的对待，其主要原因恐怕在于：当他出使北京之际，俄国人正在阿穆尔河沿岸到处骚扰抢劫。但巴伊科夫丝毫未提到这一点”（下卷第146页）。这是巴伊科夫有意隐瞒事实真相，因为当巴伊科夫在北京时，清政府已经就沙俄哥萨克在黑龙江沿岸的暴行向他提出责问，他竟诡称斯捷潘诺夫一伙是不受俄国政府约束的盗匪，他们的所作所为绝非奉沙皇的谕旨行事（下卷第339页）。其实，

1653年斯捷潘诺夫就被俄国政府任命为所谓“大阿穆尔河+新达斡尔地区长官”，对他在黑龙江的侵略暴行，沙皇还曾传令嘉奖，而巴伊科夫竟当面撒谎，抵赖沙俄政府的侵略罪责，这样毫无诚意，还谈得上什么“友谊”和“亲善”呢！

巴伊科夫的正式外交使命虽未完成，但是沙俄政府要求他们完成的“秘密”使命，却是颇有收获的。这一次巴伊科夫使团探明了由西伯利亚经我国天山北路和天山南路来北京的道路，调查了北京、张家口、归化城各地的情况，特别是仔细地调查了北京各方面的情况。所以一个西方作家也说：“巴伊科夫的出使虽然在外交上失败了，但从搜集情报的观点着眼，却是成功的”。

四、沙俄扩大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和斯帕法里使华

斯捷潘诺夫接替哈巴罗夫以后，一直在黑龙江上下游流窜。1658年（顺治十三年），清政府遣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瑚达率军千余人讨伐斯捷潘诺夫。7月间，中俄两军在松花江口附近交战，中国军队取得了歼灭沙俄侵略者的重大胜利，俄军侵略头目斯捷潘诺夫在战斗中丧命。次年，俄军在黑龙江上游左右两岸强筑的两个侵略据点雅克萨和呼玛尔堡，也为我方军民拔除。

但是，清政府对当时沙俄侵略的野心，还缺乏足够的估计。斯捷潘诺夫被歼以后，清政府就放松警惕，从沿江一带撤退军队。实际上，就在斯捷潘诺夫覆灭的当年，甚至在此以前，另一批来自叶尼塞斯克的哥萨克殖民者，就在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地区强建新的侵略据点了。

早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沙俄侵略者的魔爪就伸入贝加尔湖以东我国蒙古和通古斯各族人民游牧狩猎的地区。五十年代初，这伙匪徒一直窜到石勒喀河和尼布楚河汇合处的尼布楚地方，在该地强筑堡垒。当地我国各族人民奋起反抗，这伙侵略者无法在

尼布楚立足，终于被迫逃窜。1658年，沙俄侵略者又在尼布楚地方重筑堡垒，并计划在此驻兵屯田，作为在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上游的一个侵略据点，逐步向东南推进。可是当地各族人民经常向这伙侵略者发动袭击，侵略者兵员不足，粮食奇缺，困守孤堡，处境极为狼狈。

在斯捷潘诺夫覆灭之后七年，黑龙江上又出现一伙新的俄国匪徒。这就是在西伯利亚服役的波兰战俘切尔尼戈夫斯基匪帮，他纠集了几十名亡命之徒，于1665年冬季窜到雅克萨故址，重建阿尔巴津，他们以此为巢穴，一方面日益扩大其劫掠活动的范围，一方面又向附近我国少数民族头人诱降。居住在嫩江流域的索伦部头人根特木尔就是在切尔尼戈夫斯基的策动下，于1667年投靠沙俄的。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沙俄除了在黑龙江流域加强它的侵略据点，扩大它的侵略范围外，又侵入我国贝加尔湖东南的色楞格河流域。1666年，沙俄侵略者在色楞格河上蒙古土谢图汗部的领地内强筑色楞格斯克。为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向莫斯科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下卷第272页）。

1667年（康熙六年），康熙开始亲政。他十分重视沙俄侵略我国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问题。1670年，清朝宁古塔将军巴海奉命派员赴尼布楚投递文书，对沙俄的侵略行径提出质问，要求引渡根特木尔。同年，沙俄尼布楚总督阿尔申斯基派遣到北京的使者米洛瓦诺夫一行归国时，由达呼尔总管孟额德陪同使团返尼布楚，将康熙致沙皇的信件面交阿尔申斯基。康熙在信中要求沙皇“还我逃遁根特木尔”，要求沙皇勿再“纵尔罗刹（当时清廷对侵扰我东北边疆的沙俄哥萨克的通称），扰我边陲”（下卷第372页），只有这样，两国之间才有可能保持和平。此外，孟额德还多次去尼布楚，要求俄方对康熙的信件作出正式答复。可是阿尔

申斯基一味空言搪塞，而沙俄政府则借口不识信中文字(满文)，对康熙郑重提出的保持两国和平关系的起码要求不予理会。

1675年，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特命尼古拉·斯帕法里以大使名义出使中国。沙皇这次派遣斯帕法里使华，在目的和手法上同二十年前派遣巴伊科夫使华几乎毫无二致：一、口头上高唱“友好”、“睦邻”，实际上坚持军事侵略；二、要求中国开放门户，扩大中俄之间的贸易，谋取商业上的暴利；三、以外交活动为掩护，搜集中国情报，刺探中国虚实，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做准备。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使节的级别更高，使团的规模更大，而斯帕法里又是一个搞阴谋活动的能手，在中国进行了更多的不可告人的活动。

巴德利在本书中全文发表了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纪行》(除关于地形地貌的细节描写被删节外)和《出使报告》(除回国途中结尾部分原稿有缺佚外)。巴德利自己还撰写了斯帕法里传略并加了若干评注。

斯帕法里的《西伯利亚纪行》和《出使报告》洋洋数十万言，是沙俄为其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两面派外交的一份绝妙的自供状。

1675年春，斯帕法里使团从莫斯科出发，经西伯利亚由我国东北入境。1676年5月25日(俄历5月15日)斯帕法里使团一行抵达北京。

当时，能否改进中俄两国的关系，关键在于：沙俄政府是否履行清朝政府多次向俄方提出的两项起码的要求：一、引渡根特木尔；二、制止哥萨克在我国黑龙江地区的侵略罪行。斯帕法里对此毫无诚意，他来华途中经过叶尼塞斯克时，听到中国发生了三藩之乱，就认为可以乘机向清朝政府进行讹诈(下卷第257、259页)。进入中国境内，到达大兴安岭时，他竟认为那是当时西伯利亚的边界和终点，并且狂呼：“但愿上帝保佑，西伯利亚的疆界有朝一日将荣耀地向前扩张，甚至由地球的一端达到地球的另一端。”(下卷第284

页)这就表明,斯帕法里不愧为沙皇俄国对外执行无止境侵略扩张政策的一名忠实走卒。同时也表明,他同中国官员谈判时,口口声声表示:“沙皇陛下愿意同他们的至尊君主保持友好睦邻关系”(下卷第286页)、“沙皇陛下的意旨是友好与和平”(下卷第287页),只不过是有一套骗人的外交辞令。

关于引渡根特木尔问题,沙俄政府早就下定决心,对中国的要求不予理会。斯帕法里途经尼布楚时,还特别接见了根特木尔,要他“不必担心”,保证“陛下(指沙皇)是不会抛弃他的”(下卷第290页)。当斯帕法里抵达嫩江,清政府派去迎接的礼部侍郎马喇向他提出这一问题时,斯帕法里竟诡称:因为康熙给沙皇的信件是用满文写的,俄国方面一直没有找到通晓满文的译员,所以沙皇根本不知康熙在信中有此要求。马喇当即予以驳斥:康熙给沙皇的信件有满、蒙两种文本,而且中国使者将信件递交给俄方时,当时就曾经两次译成俄文,并且作了口头上的说明,“因此,沙皇至今还不了解信件的内容,那是完全不能令人置信的。”斯帕法里在他的出使报告中承认,马喇当场揭穿他的谎言,曾使他陷入“窘境”(下卷第297页)。

关于制止哥萨克在黑龙江地区的侵略暴行问题,沙俄当局更是反其道而行之。就在斯帕法里来华途中,沙皇敕命的“阿尔巴津总管”切尔尼戈夫斯基竟倾巢出犯,带领部众三百人窜到黑龙江以南几百里远的甘河地区,妄图裹胁当地达呼尔部落投俄。就在斯帕法里从尼布楚来嫩江途中,这一伙雅克萨匪徒又沿黑龙江而下,并上溯精奇里江。他们一碰到我国的贡民或皮毛商人,就威胁他们说:“沙皇已命令我们在黑龙江和其他河流到处建立城镇,你们必须向我们纳贡,否则,我们就要把你们消灭干净”(下卷第300页)。马喇在嫩江就上述事件向斯帕法里提出严重抗议时,就尖锐地指出:“你们俄国人说的是同一回事,干的却是另一回事”,“对于

一个一方面派出大使，另一方面又在发动战争的国家，我们能够期待什么和平与友谊呢？”（同上）

面对马喇的抗议，斯帕法里虽能言善辩，也无辞以对，他只好推托说：“只要本人此次出使成功，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下卷第 301 页）。在雅克萨的哥萨克前来嫩江同他取得联系时，斯帕法里当面告诫前来的哥萨克，并写信通知雅克萨的哥萨克头目，要他们“停止对中国贡民的一切挑衅活动，不得收取贡物或进行袭击，直到上帝保佑本使团完成使命、得知结果之时”（下卷第 310 页）。注意，斯帕法里的这一条“禁令”是有其时限的，它仅仅在他出使之时适用。事实上，即使在他出使之时，这一条禁令也未起多大作用。

6 月间，斯帕法里呈递国书后，马上根据沙俄政府的“训令”，向清朝政府递交一份照会，提出释放被俘的哥萨克入侵者，引渡俄国逃亡者，扩大中俄之间的贸易，准许两国商民自由往来以及中国派遣使臣赴俄报聘等十二条要求。可是对于清朝政府所提的两项要求，他却不作任何正式答复。

斯帕法里留在北京期间，更多的时间是用于做买卖并进行了一系列不可告人的活动。

在沙皇给斯帕法里的“谕令”中，本来就要求他在出使期间，应“通过一切手段”，即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查明中国的种种情况，要求他“务必全力以赴，亲自向所有了解情况的人作调查，力求全面真实。”而且要求他“必须非常精确地将一切情况逐条写进出使报告，并写一份对整个中华帝国的介绍”（下卷第 243 页）。沙皇的御旨，斯帕法里都遵命办理。除了已经写入出使报告中的，斯帕法里还另有根据“秘密探听到的情况”写成的“密码报告”（下卷第 310 页）。他在给沙皇的奏疏中，虽然只提过一次，但决不能说，这种“秘密报告”他只写过一次。